

教育人文学术丛书



乡土的逃离与回归

刘铁芳 著

——乡村教育的人文重建

福建教育出版社

教育人文学术丛书

乡土的逃离与回归： 乡村教育的人文重建

刘铁芳 著

福建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乡土的逃离与回归：乡村教育的人文重建/刘铁芳著.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4
(教育人文学术丛书/刘铁芳主编)
ISBN 978-7-5334-4978-0

I. 乡… II. 刘… III. 乡村教育—研究—中国
IV. G7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43005 号

教育人文学术丛书

乡土的逃离与回归：乡村教育的人文重建

刘铁芳 著

出版发行 福建教育出版社

(福州梦山路 27 号 邮编：350001 电话：0591-83726971 83733693
传真：83726980 网址：www.fep.com.cn)

印 刷 福州晚报印刷厂

(福州市西洋路 4 号 邮编：350005)

开 本 72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3.5

字 数 144 千

版 次 2008 年 4 月第 1 版 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34-4978-0

定 价 23.00 元

如发现本书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
请向出版科（电话：0591-83726019）调换。

教育人文学术丛书编委会

学术顾问

钱理群 劳凯声

编 委

金生铉 石中英 刘铁芳 刘良华
刘云杉 李政涛 孙传钊 王凌云

执行主编

刘铁芳

总 序

教育乃是精神成人的宏伟之事业，教育的根柢首在立人。教育的人文旨趣，其根本正在于对教育之作为立人伟业的殷殷守护。倡导教育人文，不仅在提升日常教育生活的品质，也在谋求整体教育实践精神的生长生成；甚至，从更深远的意义而言，乃在于谋求国民人格精神旨趣的提升与超越。“教育人文”不仅是理想世界的教育精神镜像，更是一种当下教育实践的踊跃动姿，是当下教育实践的人文动姿之可能性的发掘与显现。

学术之名，既在按章论节，煌煌巨构，同样存在于绵密幽微的精耕细作之中。本丛书冠以“教育人文学术”，旨在悬置时下的教育言说范式，力求以文化的、心灵的、生命的敏锐触角，去细密地探究当下中国教育的人文机理。在此，我们

试图传达这样一种心向：学术乃“天下之公器”，我们期待的教育人文学术，乃是以理性探究与审慎言说回应当下中国社会深层的教育问题，力求避免教育学术的自话自说，保持教育人文学术对当下教育现实的生动的张力。

教育人文建设是一项扎根培元的事业，它需要我们立足长远，有开阔的视野，免于浮躁和激进，撇开大而全的体系化言说语式与整体性、替代性的言说姿态，直面教育的基本问题，踏踏实实地回到教育的原点，重温经典，探寻当下教育的深层肌理，夯实现实教育的思想根基。

我们深知，教育文化精神的培育不是一朝一夕之功，不可能一蹴而就地完成当下教育精神的转换，我们所需要的也许是几代人的努力。所以，对于当下的教育思想志业而言，最重要的，也许就是如何秉承蔡元培先生的教育思想传统，赓续中国现代教育的思想薪火，同时旁借西学人文思想资源，激活当下教育的思想空间，一点一滴地培植教育实践的内在精神。

我们深知，个人的力量是绵薄的，但只要我们是不断地接近教育的原点，敞开对当下教育基本问题的应答，怀抱愚公移山之志，我们就会在教育思想的路上，执著地前行。

先人有言：

“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刘铁芳

2008年3月

目 录

引言 乡村教育的人文重建：起点与路径	1
乡村教育的问题与出路：城市取向的乡村教育何以超越 ...	16
乡村的终结与乡村教育的文化缺失	35
重新确立乡村教育的根本目标	48
破碎文化体系中的乡村教育：	
乡村教育重建如何可能	65
徜徉在乡村自然与乡土人文之间	
——一位乡村少年成长史的现象学解读	88
生命自然善好的守护：《草房子》的教育哲学意蕴	105
春晖中学：现代教育的田园牧歌	126

鲁迅和沈从文：乡土中国教育发展的两种精神脉象	142
乡村社会的文化想象	161
乡村教育在现代教育中的位序	183
后记：乡村教育、乡村文化与乡村教育人文	
——我的乡村教育人文研究：回顾与反思	198

引言 乡村教育的人文重建： 起点与路径

偶然看到《湖南卫视·乡村发现》采访国内知名摄影家焦波，他的代表作是以自己老家父母的日常生活为题材的全纪实性的《俺爹俺妈》。^{〔1〕}他朴素的摄影中所传达出来的来自乡村社会的温暖人性自不必多说，而其中他年迈的母亲对他说的一句话让我尤其记忆深刻，“你在外面奔波，累了可以回来种地”。我忽然想起，我的父亲也曾经跟我讲过几次，在外面不

〔1〕 焦波的《俺爹俺妈》实际上是对乡村社会的重新发现，其影像中的父亲母亲可以说是每个乡村儿女的母亲形象，同时也是从乡土社会中走出来的当下中国人的母亲形象的象征。参见焦波著《俺爹俺妈》，华艺出版社。同时参见 <http://book.qq.com/zt/2005/niang/>。

好过了，不要紧，可以回来种地。



焦波：《俺爹俺妈》，华艺出版社，2005年。

“回来种地”，是一句简单的话，其实这中间蕴涵着的是一种日益被当下生活世界的浮华所遮蔽的朴素的生存理念。“回来种地”，最直接的意义是从喧嚣的城市世界中退守，回到乡村，以简单的劳作求得自己的生存。如费孝通先生所说，“靠种地谋生的人才明白泥土的可贵。城里人可以用土气来藐视乡下人，但是乡下，‘土’是他们的命根”。^{〔1〕}其深层的意蕴则是，那曾经养育了我们一代又一代先祖的乡村厚土，乃是我们的生命得以退守的永远的家园，是我们从技术所围裹的现代性藩篱中可退而守之的生存底线。

著名学者钱理群先生在编完《贵州读本》后曾这样表达他

〔1〕 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7页。

的感受：

“这一个月，我一直生活在贵州，也一直在与诸君进行笔谈，内心有许多感受，有的已自觉不自觉地倾注于笔端，有的却永远藏在心的深处了。我好像第一次进入贵州，而以前只是一个陌生人，行走在这块土地上而已。同时，我也在重新发现、认识我自己：原来我和这块土地及生息其中的普通百姓，竟是如此缠绕，密不可分，这是我的真正的回乡之旅。坦白地说，这一个多月，我的日子过得并不轻松，国际、国内，中国知识分子中发生的许多事情，都让我忧心如焚，并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在这种心境下，只要一打开电脑，进入贵州，我的心就平静下来，仿佛回到真实的大地，感受到某种永恒的东西。于是，所有外界的纷扰，就变得无足轻重，有如过眼烟云了。真没想到，这次编《贵州读本》，对于我，竟会起到精神提升的作用——这块神奇的土地，又一次施恩于我，真不知该如何报答了。”^{〔1〕}

钱先生在这里表达的正是另一种“回来种地”，或者叫“回归乡土”的感受。因为在心灵世界中敞开了通向贵州乡土的通道，所以，钱先生“只要一打开电脑，进入贵州，我的心就平静下来，仿佛回到真实的大地，感受到某种永恒的东西”，贵州乡土俨然就成了钱先生生命世界真实信靠的精神大地。与之相对的生存姿态则是“逃离乡土”。这里的“逃离乡土”不

〔1〕 钱理群：《追寻生存之根——我的退思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00~201页。

仅是一种现实的行动，即一种走出乡村社会的姿态；更是一种生命的姿态，即一种把自我存在之根从乡村社会拔离的姿态。逃离与回归，源于现代性所开启的价值世界与乡土价值世界的内在紧张与冲突。乡土社会的安宁、朴素、宽厚，更多地珍视生存本身的价值；现代性所开启的价值世界更多的无疑是进取、扩展、发展，更强调生存之上的获得性价值。逃离乡土的冲动，无疑是生命的获得性价值，或者叫功用性价值，是对生存性价值的压倒性颠覆。^[1]

在二元对立的格局之中，乡土社会只能作为现代性的退守之所，直白地说，乡土社会始终无法摆脱功用化的存在姿态，这实际上乃是由现代性本身所内含的功用化的存在本性所决定。对乡村社会功用化的超越依赖于乡村社会与现代性之间的二元格局的超越，而二元格局的超越实际上有赖于整个现代生活所孕育的生存姿态的整体超越。在这个意义上，激活乡土社会在现代性中的深层意蕴，从而内在扩展现代性之中的功用化的生存姿态，拓展现代性本身的内涵，从而善导为物质与技术藩篱所遮蔽的现代人的生存姿态，乃是事关现代性健全发展的重要内容。

严格说来，逃离与回归乃是同时存在于当下每个人生命意

[1] 有一首流行歌《流浪的孩子》是这样唱的：“离家的孩子流浪在外边/没有那好衣裳也没有好烟/好不容易找份工作辛勤地把活干/心里头淌着泪我脸上流着汗/离家的孩子夜里又难眠/想起了远方的爹娘泪流满面/春天已百花开秋天落叶黄/冬天已下雪了你千万别着凉/月儿圆呀月儿圆/月儿圆呀又过了一年/不是这孩子我心中无挂牵/异乡的生活实在是难。”这其中唱出的“离家”、“流浪”、“异乡”都较好地传达出一种“逃离乡土”中的生命境遇。

识之中的基本生命姿态，这实际上是置身现代性中的我们之内在生命的断裂与冲撞的表征。所不同的是，有些人更表现出对乡土的逃离，置身乡土却找不到生命的意义；有些人则能在心中守住乡土之根，从乡土社会之中找到自我生命滋养的可能性，依然能保持乡土作为生命的真实之“根”。生命是需要整体滋养的，现代性并不意味着截断我们与乡土社会的根本性联系。乡土社会不仅仅是作为现代社会的基础，同样是作为个体精神滋养的根基。

不仅如此，费孝通先生早在1947年出版的《乡土中国》中就开宗明义地说：“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我说中国社会的基层是乡土性的，那是因为我考虑到从这基层上曾长出一层比较上和乡土基层不完全相同的社会，而且在近百年来更在东西方接触边缘上发生了一种很特殊的社会。这些社会的特性我们暂时不提，将来再说。我们不妨先集中注意那些被称为土头土脑的乡下人。他们才是中国社会的基层。”^{〔1〕}从历史而言，自不必说，我们是一个几千年被农业文明主宰的社会；就当下的社会发展态势而言，我们正在逐渐告别农业文明而进入工业文明的时代，但由农业、农村、农民构成的所谓“三农问题”依然是当下中国社会的重中之重，其数量依然占据着绝对优势。正因为如此，如果单从历史以及当下中国社会的外在形式结构而言，乡土中国可以说是非常准确地概括了中国社会的基本形态。不管怎样，“乡土中国”对于当下而言，依然是概括中国社会不可或缺的基本内涵。正因为如此，我们

〔1〕 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6页。

除了在工业化、城市化的背景与框架下来认识乡村社会，我们还同样需要立足于乡土中国来重新认识乡村社会的发展与改造，重新审视几千年的农业文明的累积对于乡村社会意味着什么，对于乡村社会的发展与乡村少年的未来意味着的什么。

在这个意义上，重新认识乡土社会的意义，而不仅仅是以强势与中心的姿态来审视作为弱势者、补充者的乡土社会，不仅仅是将其作为中国社会迈向现代化的阻碍——尽管这种阻碍必然存在——其间的意义就显得十分重要。在这里，乡土社会必须是作为以城市文明为中心的现代性结构的有机的、不可或缺的内涵，甚至是永远的基础与背景，来作为提升现代性品格，善导当下人生存的重要向度；同时也是作为中国人独特生命样式的基本背景与内在结构，从而为中华民族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并显现自身的独特意蕴提供重要的支持。这意味着充分激活乡土社会的文化想象，从而激活乡土社会在当下人的生命结构中的不可替代的内在意义，而不仅仅是作为在功用性上处于劣势的当下生命结构中的他者而存在，这实际上是被今天沉迷于现代性的物欲狂欢之中的人们所忽视的必修课。

回到现实，就当下而言，乡村社会的整体发展与乡村教育的人文生态至少面临着以下根本性问题：（1）乡村文化价值在以物的现代化诉求中的整体贬值，由此而直接导致乡土文化的边缘化，传统乡村文化迅即在当下的乡村生活中随着年长者的逐渐逝去而退却；（2）由传统乡村士绅所代表的乡村知识人与村民结合构成的乡村社会结构解体，稍微有点知识与素养的乡村知识人呈现出整体的对乡土的逃离，这直接导致乡村社会文化的空心化，即已经失去了乡村文化生产与传播的主体，乡村

社会实质上处于一种无文化、甚至反文化的放任状态；（3）社会整体文化事业的产业化与乡村对精英文化接受能力的欠缺，直接导致精英文化传播在乡村社会中的整体缺席，文化对乡村社会的渗透更多基于市场原则，而迎合村民社会当下的需要，实际上大大减小了对乡村社会文化引导的可能性。

既有的文化已经退却，优秀的文化难以进入，这必然导致乡村社会整体文化的虚空。作为乡村社会文化坚守之地的就只剩下乡村学校了。问题在于，在这种背景下，乡村学校如何可能成为乡村社会的文化绿洲？一方面，乡村学校本身难免需要承受时下乡村文化生态的冲击，加上精英文化对乡村社会的缺席造成乡村教师对精英文化接受的可能性狭小；更重要的一面是，乡村少年备受时下乡村文化的熏染，所谓胳膊扭不过大腿，要乡村学校担当拯救乡村少年健全文化发展的使命显然要求过高。这意味着乡村教育的人文生态实际上处于“内忧外患”的不利处境，一方面自身没有了必要的文化底蕴气来提升自我文化自信，另一方面乡村人文又在整个现代化的价值序列中失去了应有的关照，而成为落后的他者。

与此同时，更基本的问题是，如果以“回归乡土”与“逃离乡土”作为基本的价值向度，我们不难看出，当下的乡村教育设计，扩而言之，我们的整体教育设计，实际上更多地就是一种“逃离乡土”式的教育设计，乡村只是作为城市文明的参照、补充，作为被城市所“观看”、俯视的对象，乡村作为前现代的“他者”被排斥在为教育所展开的现代性想象的边缘。在这个背景下，实际究竟还有没有乡村教育，本身就是个问题。乡村社会的教育目标乃是怎样把个体认同于单一的现代

性的想象结构之中，从而把每个人从原初的乡土社会中拔出来，从而早早地截断了乡土社会滋养现代性的每个人的可能性。当然，首当其冲，就是把乡土社会之中的乡村少年同样从乡土社会中剥离出来，让他们在教育所展开的现代性想象的引导中，一点点远离自己脚下的土地，以至于生活在乡村社会，却很难把自我存在的根基扎入乡土之中，又无法进入主流社会想象之中，而更多地成为无根的存在，成为置身乡土社会之中的精神流浪者。正如钱理群先生所言：

“当人们，特别是年轻的一代，对生养、培育自己的这块土地一无所知，对其所蕴含的深厚的文化，厮守在其上的人民，在认识、情感，以至心理上产生疏离感、陌生感时，就在实际上失落了不只是物质的，更是精神的‘家园’。当他们逃离土地，远走他乡与异国，就走上了永远的‘心灵的不归路’；即使不离乡土，也会因失去家园感而陷于生命的虚空。在我们看来，这不仅可能导致民族精神的危机，更是人自身的存在危机：一旦从养育自己的泥土中拔出，人就失去了自我存在的基本依据，成为‘无根’的人。”^{〔1〕}

正因为如此，我们是——且必须是——在双重意义上谈论乡土社会与乡村教育：其一就是直接地为乡村少年寻求置身乡土社会的精神之根，让他们把生命之根牢牢地植入乡土社会之中，从而让他们从小就能拥有健全的精神生活，而不至于使自

〔1〕 钱理群：《追寻生存之根——我的退思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52页。

已徘徊在现代性的门槛之外；其二就是为整个社会，为全体少年生命的发展谋求置身现代性之中的精神根基，让他们思想与精神的触角能越过现代性的圈隅，直接地让自我在与乡土社会的接壤过程中获得永不衰竭的生命底气。前者是立足于乡村社会本身来谈论乡村教育的内在发展；后者是立足于整个社会，立足于现代化本身来谈论乡村教育在整个现代性框架中的发展脉络。

我们需要积极引导沉迷于现代性狂欢中的年轻一代，去关心、认识脚下的土地，“去发现、认识其中深厚的地理文化与历史文化，去与祖祖辈辈耕耘于这块土地上的父老乡亲们对话，共同感受生命的快乐和痛苦，从中领悟人的生命意义与价值，并将这一切融入自己的灵魂与血肉中，成为自我生命的底蕴与存在之根：这就能为以后一生的发展，奠定一个坚实而丰厚的精神底子。”^{〔1〕}显然，这不仅仅是就乡村少年而言，而事关当下教育中每个人的生命品质。

对乡土的逃离乃是在功用化的注视中乡土自身价值的锁闭，与我们在现实与心灵世界中对乡土社会的远离；回归乡土则意味着重新激活乡土本身的价值，激活乡土与置身现代化围裹中的我们的精神与生命的联系，敞开我们在现实中，更是在心灵世界中亲近乡土的可能性。惟有充分激活乡土自身的永恒性价值，才可能对抗单一现代化诉求中的功用价值对乡土的遮蔽与乡土在现代化视界中的沉沦与隐匿。乡土价值的激活与显

〔1〕 钱理群：《追寻生存之根——我的退思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52页。